

桂林1944——苦难的大疏散

□ 莫茜涵



1944年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，急于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，实施“一号作战计划”，豫湘桂战役全面铺开。在日渐紧张的战争形势下，从6月到9月，桂林发布了三次疏散令，3个月间，人口近60万、一度热闹繁华的桂林因兵燹彻底沦为一座空城，这就是无限凄惨的桂林大疏散。

疏散前：繁华的桂林城

随着华北、华东、华中的陷落，大量的沦陷区机关、工厂、商号迁来桂林，桂林人口骤增，由战前的6万多人增至50多万人。城市人口的增加，扩大了市场需求。各地商号不断迁入桂林，各种商品和服务日益丰富，各种娱乐消费场所也日益增多。商业的繁荣自然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，邻省银行纷纷在桂林设立办事机构，开展业务。据统计，截至1944年，除了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、中央信托局、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外，桂林还有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福建、上海、金城、中国实业、兴文、中国工矿、新华等11家银行，金融业务非常发达，且各个银行都有盈利。桂林由相对落后的小城市逐渐成为西南大后方商业发达、社会繁荣的大型城市。除此以外，由北方南下而来的不少文化机构和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桂林。据统计，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及文学家、戏剧家、音乐家、画家、新闻工作者、科学家、学者、教授等著名文人学者之多，有一个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。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、记者、编辑、出版人等有1000多人，著名的有三三百人。1944年，欧阳予倩、田汉等进步文化人还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，聚集西南8省文艺团队演出剧目60多个，活动轰轰烈烈。这一时期桂林还经常性地举办各类音乐、艺术和美术展览活动，几乎平均每年都要举办30多个画展。街头经常有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。李济深曾说，桂林是当时“江南唯一繁盛之地”。有文章记录了当时桂林的繁华程度：

“抗战以后，外省人士与机关之迁来络绎不绝，人口激增，市面顿呈活气，市政处亦加紧进行建设工作。于是重要街道都成立柏油马路，自来水、自动电话都在敷设之中（注：截至1944年桂林陷落时，桂林是当时广西唯一有自动电话的城市）。而摩登商店亦与日俱增。华美之旅馆，堂皇之饭店，新式之戏院，应时之商品（如冰激凌咖啡啤酒等）现在几乎应有尽有。尤其特别而刺激较深的，半年以前，走在桂林市街上者，不是灰色制服之男女、公务员与学生，便是大布之衣的老先生和太太小姐们。洋装革履，烫发时装之男女，可算绝无仅有。现在大不相同了，除了灰色衣外，很多穿长袍大褂的绅士模样的人物，高跟皮鞋长旗袍的太大小姐。从前坐洋车的人都不大见，现在风驰电掣般的汽车，和油光碧绿的绸丝包车，亦不绝于途，可以说桂林大变了。”大疏散以前，桂林呈现出异常的繁荣。

6月26日：第一号疏散令

1944年5月27日，由华中日军发动进攻，拉开了长衡会战的序幕。6月18日，长沙失守。6月22日，距离桂林350公里的衡阳保卫战打响，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，24日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，部署广西防守要务，宣布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以韦云淞为司令的桂林城防司令部。6月25日，韦云淞在省府大礼堂召集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代表讨论桂林疏散事宜。6月26日，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一号疏散令，谕告政府机关、学校和民众及早疏散撤离桂林城。

桂林市各机关团体、学校、工厂、仓库、商店、银行纷纷开始撤离。桂林交通原本尚属方便，西行有火车，南下有民船，此外还有公路汽车。但撤离的人实在太多，火车站、汽车站、码头到处是人。小部分人沿漓江水路撤往昭平、黄姚、八步，或沿柳江水路撤往融安、罗城；大部分人沿湘桂铁路南撤柳州，再转撤桂西北河池南丹，再到独山、都匀。最远的就是火车北站和南站，车站上人山人海，挤满了人塞满了行李，火车开行已无定时，每一辆车都塞得满满的：车顶上，机车两旁，甚至车厢下面都坐着人。车厢过道堆满行李，椅背上也坐着人，更多人拥挤着一天一夜地站着。人的呼吸、汗臭，加上小孩子便溺，形成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。

许多人根本坐不上车船，只能靠两条腿走路。不只是桂林市民，还有众多从北往南逃难的难民。老百姓并不明白疏散的真实意义，对他们来说疏散就是“跑日本”，就是逃难，而逃难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——拖儿带女，肩挑手提的背井离乡，疏散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大难临头。

重庆《新华日报》1944年7月12日刊载了古曼的《在疏散的日子里》：

在一个星期内，桂林疏散了三十多万人，街道似乎比以前冷静了一些，商店的货架空了不少，有的干脆停业了。到处都是大贱卖和大廉价，做生意的人想捞回一点钱作逃难盘费，老牌不扣的国货公司也七折发售日用品，物价的确下降了，但买的人并不多，手上稍有几个钱的人，都在作逃难的准备，谁还有余钱来买东西呢？

故衣摊、香烟摊和卖旧货的摊子却一天多过一天，由丽泽门外故衣场起沿着三多路出榕荫路、桂西路一直到桂东路尾端，满街都是这些摊子，价钱比平时便宜很多。摆香烟摊子的有些是香烟厂的工人和职员，烟厂倒闭了，没有钱发遣散费，便发了香烟，但倒霉的是大家都在终日惶惶，仿佛连抽香烟也减少了。

一般新书店这几天来简直是“门可罗雀”，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岗位。《大公报》和《广西晚报》在6月下旬先后停刊，各日报由7月1日起一律缩小幅改出半张，日报出得很迟，每天都要到中午才能看到，因为许多器材都运走了。

人，能走的走了很多，器材能动的也动了不少。最后彷徨无计的是一般被裁撤的机关职员、



工厂工人和店员。他们中有的拿到了千多元的遣散费，但一家数口，简直是寸步难行。这种遣而不散的人，在留桂的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比例。

由湘桂铁路涌来了大批大批的难民，是由长沙衡阳等地来的。开始逃难的时候，也许还有几个钱，但一逃再逃之后，到桂林时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湖南会馆里住满了难民，连会馆附近的骑楼下也睡满了人。他们一心以为跑到桂林之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，谁知道桂林当局在7月初下令所有难民和乞丐限三天之内一律离境，这一着，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，他们已经再也无力走动了，许多湖南难民都异口同声说，“以后死也不逃难了”，有一部分打算冒险回老家去。他们说：“死，还是死到家乡去！”

中南路最热闹的马路上，一个难妇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大约4岁，一个还在吃奶，他们坐在人行道上，面前放着一张纸，写着：“丈夫一年未回，无力养活孩子，愿意出卖，要大要小，任君选择。”这是多么惨痛的画面啊！

针对这次大疏散，中共中央作出了周密部署。1944年7月8日，董必武给周恩来发电报：“一、敌已越衡阳，向西南前进，桂林震动，纷纷搬家。我们对该处疏散分两部分，廖夫人（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）、柳亚子各五万元已汇出，叶夫人（指叶挺夫人李秀英）十万元另设法汇。对文化人（约二十人）已派李亚群去桂秘密办理，对无法走的人予以帮助，如愿留的则鼓励他们留，帮助疏散家属，限期三个月留桂林，完毕，则期满回来，否则办完即回。三月后，敌被阻零陵线则李回，只留二十万由狄超白、邵荃麟、张锡昌三人办理，并已把政治形势的估计及党的政策等告李转知桂林方面。二、柳、廖等向桂东南之八步转移，柳已去。三、任公李济深拟也向梧州撤退，这是他们新的出路，并酝酿已久，他们开始不要做太突出，仍以抗战口号斗争，不要正面攻击蒋。四、闻余汉谋暗中表示，若粤汉湘桂皆失，是愿留敌后。”

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中明确指示：“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，对叶、廖、柳三家宜多接济，以便其能早日移动，如桂林危，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。”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，大批文化人开始撤离桂林。

9月8日、12日：连发第二、三号疏散令

衡阳沦陷后，日军沿湘桂铁路长驱直入，大举进犯广西，9月4日发动进攻湘桂线，桂林已是岌岌可危。9月8日，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第二号疏散令，机关开始大撤退。12日紧接着发布了第三号强迫疏散令，要求所有桂林居民在14日正午前离开，如疏散期满仍然私自滞留在市内者，则以汉奸论处。同一天，美国飞虎队陈纳德下令破坏桂林机场，随后，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撤离桂林。

月底第一号疏散令后，因见日军并没有来，许多人又回到了城里，因此，9月份的桂林城里仍有40多万人。省府机关分批乘火车前往宜山，市政府在15日迁往临桂的两江（后再迁往罗城）。据黄旭初回忆录载：“十二日到柳州，赴桂的火车已不易搭，十三日偕四十六军黎行恕军长乘汽车行，傍晚到桂，城中已完全疏散完毕，市上只见军人，不见平民，省府职员，惟各厅处长委员等候候我，其余已分两批上了火车，第一批已开行前往宜山。夜间，我参加张司令长官在白公馆召集的会报，多是与防守桂林有关的事。十四日晨间，知道我第九十三军昨夜放弃全桂撤退，烧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（军长陈牧农后被正法），张司令长官原催省府早日疏迁，而省府第二批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，我只得力催铁路当局，必须这列车开出后我才离桂。我已无暇到车站视察情形，不知有多少列车开不出？但省府的车都难开如此，也就可以想见普通民众的车困难是不可想象了……”

最近离世的女作家琼瑶6岁时随家人沿湘桂线逃亡，途中得到一位叫曾彪的连长的帮助，千辛万苦抵达桂林。抵达两天后，随着战火的蔓延，桂林再次紧急疏散。曾连长的部队奉命“死守桂林”，不能与琼瑶一家同行，他便派部下到火车上，为琼瑶一家抢占位置，送他们上车。她



③



图①：1944年桂林大疏散时期，火车车厢上有粉笔写的留言，车厢底下躺着难民，这是那个特殊时期才有的特殊景象。
图②：流亡的民众拖家带口，勉强挤在火车车厢与车轮之间的狭窄空间里。
图③：公路上有从北往南撤退的军车和军人，也有肩挑手提离开桂林的难民。
图④：湘桂铁路上的火车已然成了难民营。
(本版图片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)